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China

中国产业集群的 演化与发展

◎ 张晓波 阮建青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 / 张晓波, 阮建青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308-08857-2

I. ①中… II. ①张… ②阮… III. ①产业经济—经
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4517 号

中国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

张晓波 阮建青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clixia@163.com)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857-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短短 30 年时间里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在改革之初,中国似乎缺少经济学教科书上所列的经济发展的许多必要条件和环境。比如,中国的金融业很不发达,国有银行几乎不向私人企业贷款;而且中国的产权制度似乎也很不健全,国家直到 2004 年才在宪法里明确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因而,中国快速工业化的奇迹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个谜,更是个挑战。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究竟是怎么克服资金和制度的约束发展起来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在思考上述问题。通过对浙江多个产业集群数百家企业的访谈和调查,我们认为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是解释中国快速工业化之谜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改革开放后,“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式的块状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在大江南北迅速蔓延开来。按道理,当周边的企业都生产同一种产品时,竞争会非常激烈。那为什么企业还会形成集聚呢?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产业集聚通过如下三种途径给集聚的企业带来了外部规模经济:技术与信息的外溢、劳动力的积蓄与供给,以及共享的中间投入品。但是,这种集聚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适用,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产业集群会发展得如此迅猛。

在本书中,我们提出集群式生产模式的活力在于它适应了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和制度环境特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采取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道路,这严重违背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劳动力非常充裕,但资本却严重短缺的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缺乏资本的企业家不可能再去重复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模式。在短期内融资条件很难改变的情况下,产业集群的生产模式变得非常有活力。在产业集群内,一种产品的生产被分解成众多独立的工序,这些工序被分散到家庭作坊和小企业中去完成。这种生产结构的分解,使得生产的投资门槛大大降低,家庭作坊与小企业可选的投资范围大大扩大,众多潜在企业家从而得以克服资金约束成为现实的企

业家。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人口集中居住,人情关系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基础,这形成了很强的社会资本。而产业集群在空间上的集聚使得企业间的重复交易变得特别频繁。强社会资本与集群内企业重复交易的特性使得生产链条上的生产者能够在不用任何正规合约的情况下协调生产,这有效地降低了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

在产业集群发展的早期,集群内的分工降低了投资门槛,但随着门槛的降低,竞争也会加剧,因而质量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产业集群如何从数量扩张阶段演化到质量提升阶段也是本书关注的内容之一。在本书中,我们探讨了危机与产业集群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是如何克服质量问题,促进集群内产业升级的。

本书是我们在该领域中多篇研究论文的集合。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的作者是阮建青博士;第三章的作者是许成钢教授(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和张晓波教授;第四章的作者是 Cheryl Long 博士(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和张晓波教授;第五章的作者是阮建青博士;第六、七、八、九章的作者是张晓波教授和阮建青博士;第十章的作者是黄祖辉教授(浙江大学)、张晓波教授和朱允卫博士(浙江大学);第十一章的作者是 Belton Fleisher 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研究中心)、胡定寰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William McGuire(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张晓波教授。最后两章的作者是张晓波教授与阮建青博士。第三、四、十一章的原文是英文,由杨进协助翻译成中文,阮建青对译文进行了校对。

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或即将发表在下述国内外经济学期刊上:第四章的内容“Cluster-Base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Financing and Performance”即将发表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第六、七、八、九章的部分内容已经以“资本壁垒与产业集群——基于浙江濮院羊毛衫产业的案例研究”发表在《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7卷第1期),以“基于产业集群的包买商制与企业家才能”发表在《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以“Finance and Cluster-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发表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October, 2009);第十章内容以“The Role of Clustering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Wenzhou's Footwear Industry”发表在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年第19卷);第十一章内容以“The Evolution of an Industrial Cluster in China”发表在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年第21卷);第十二章内容以“危机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发表在《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和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为本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本研究在调研中得到了下述单位和部门的支持:濮院羊毛衫市场管理委员会、濮院镇政府、织里镇政府、温州市政府、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等;浙江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目录

CONTENTS

- ① 绪 论 / 1
- ② 有关工业化与产业集群的文献综述 / 5
 - 2.1 工业化发展理论 / 5
 - 2.2 产业集群理论 / 10
- ③ 中国企业的演化历程 / 18
 - 3.1 引 言 / 18
 - 3.2 乡镇企业的起源和发展 / 19
 - 3.3 乡镇企业的衰落和私营企业的繁荣 / 28
 - 3.4 本章小结 / 33
- ④ 中国产业集群的融资与绩效分析 / 36
 - 4.1 引 言 / 36
 - 4.2 相关文献梳理 / 38
 - 4.3 数据与产业集群测量方式 / 40
 - 4.4 产业集群和企业融资 / 49
 - 4.5 产业集群和企业绩效 / 56
 - 4.6 本章小结 / 59

- 5 浙江省农村工业化与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 61
 - 5.1 浙江省农村工业化发展概况 / 61
 - 5.2 浙江省产业集群概况 / 71
 - 5.3 浙江省产业质量升级情况 / 75
 - 5.4 本章小结 / 77

- 6 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化与发展(一):组织形式 / 78
 - 6.1 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变历史 / 78
 - 6.2 两种生产组织形式 / 84
 - 6.3 调研设计 / 90
 - 6.4 本章小结 / 91

- 7 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化与发展(二):克服资本壁垒 / 92
 - 7.1 引言 / 92
 - 7.2 文献综述和理论模型 / 94
 - 7.3 产业集群降低初始投资门槛 / 100
 - 7.4 产业集群降低运营资本门槛 / 103
 - 7.5 统计检验 / 107
 - 7.6 本章小结 / 110

- 8 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化与发展(三):资本回报 / 111
 - 8.1 理论模型与待检验假说 / 111
 - 8.2 数据来源与统计特性 / 119
 - 8.3 假说检验 / 123
 - 8.4 本章小结 / 131

- 9 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演化与发展(四):企业家才能 / 133
 - 9.1 引言 / 133
 - 9.2 理论分析框架 / 134
 - 9.3 企业家的分工协作与能力共享 / 135
 - 9.4 企业家才能使用与生产效率 / 139
 - 9.5 本章小结 / 143

10	温州鞋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	/ 144
10.1	引 言	/ 144
10.2	温州鞋业集群概况及调查设计	/ 145
10.3	技术壁垒的克服	/ 147
10.4	资本壁垒的突破	/ 152
10.5	体制性壁垒的突破	/ 155
10.6	本章小结	/ 156
11	织里童装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	/ 159
11.1	引 言	/ 159
11.2	织里童装产业集群的历史简述	/ 160
11.3	织里童装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	/ 162
11.4	织里童装产业集群的演化历程	/ 167
11.5	本章小结	/ 178
12	危机与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	/ 181
12.1	引 言	/ 181
12.2	浙江省产业集群遭遇危机的概况	/ 185
12.3	典型案例分析	/ 187
12.4	理论框架	/ 190
12.5	实证检验	/ 193
12.6	本章小结	/ 199
13	政策启示	/ 200
	参考文献	/ 203
	附录 2000 年浙江省 149 个块状经济统计信息	/ 224

1 绪论

发展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可能性。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主要来自农业部门。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发展农业生产是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亚洲“绿色革命”的经验表明,农业技术的进步能够显著地增加粮食的供应,提高粮食安全,减少饥荒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农业部门内部的发展很难增加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David & Otsuka, 1994),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非农收入的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如:Estudillo & Otsuka, 1999; Hayami & Kikuchi, 2000)。

自产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用了 200 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使得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日本将这一过程缩短到 10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又将这一时期缩短到 40 年^①;改革开放后发生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农村工业化过程将这一时期再度缩短。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表明,贫困不是一种命运,成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陷阱。

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能够真正有效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发展经济学家。20 世纪 50、60 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辉煌时期。Rosenstein-Rodan (1943)较早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Rosenstein-Rodan 认为贫穷国家要想获得经济持续增长,必须有一个全面推进各种工业发展的计划,因而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大推进理论。赫希曼(1958)对平衡增长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一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必遵循全面发展的模式,而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状态,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优先投资。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源首先发展关联效应强的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① 引自林毅夫为《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速水佑次郎,2003)所写的序言。

罗斯托(1962)持有与赫希曼类似的经济观点,他进一步从动态的角度将经济发展划分成五个阶段。Lewis(1954)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建立了工业化发展模型。Fei和Ranis(1964)进一步完善了刘易斯的模型。另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则通过建立增长模型研究经济增长的原因(Domar,1947;Harrod,1948;Solow,1957)。

总体而言,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发展理论具有两个特征。首先,这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可靠的市场体系,市场失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国家应该推行强有力的干预性政策;其次,物质资本的积累是这些发展理论的核心,他们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协调和配置资源,促进资本的积累,推进工业化的发展。然而,这些理论忽略了如下问题:(1)政府也有可能失效;(2)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因而,这些工业化发展理论未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从已有的发展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的减少主要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工业化模式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Lin,2007)。并且那些采用上述发展战略的国家并未能摆脱贫困的陷阱,这一时期的许多工业化发展理论后来均遭受了批评(Adelman,2000)。

在众多早期工业化发展理论被不断质疑的同时,东亚新兴经济体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快速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集群的相互分工协作获得竞争优势,并且逐渐实现了产业升级(Sonobe & Otuska,2006)。

基于产业集群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为发展经济学家思考工业化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发展模式不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意大利取得了成功^①,在东亚的日本、印尼、中国台湾、中国东部沿海等国家和地区也获得了成功(Sonobe & Otuska,2006),甚至在部分非洲地区也逐渐出现了这一模式(McCormick,1999)。因而在逻辑上可以推断这一发展模式一定具有某些适应工业化早期环境的特性。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阶段人均财富一般较少,而且资本市场往往也很不完善。而在工业化生产中,最低投资规模形成的资本壁垒是广泛存在的(Baumol & Willig,1981)。如果企业家无法克服资本壁垒,则众多潜在的企

^①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意大利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采用了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并且获得了成功,这一发展模式被学术界称为“第三意大利”(Bianchi,1998)。

企业家将无法成为现实的企业家(Banerjee & Newman,1993),工业化的萌芽将无法顺利完成。因而,在工业化萌芽阶段,企业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克服资本壁垒。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借助国家力量动员资金并配置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上,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但是这一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很难获得成功。另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King & Levine,1993;Rajan & Zingales,1998;Ayyagari, Demirgüç-Kunt & Maksimovic,2006),因而一般的政策建议是优先发展资本市场,然后再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一个具有完善资本市场的国家往往已经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否必须等待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建立起来之后才开始发展?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经验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年均实际GDP增长率超过9%的速度高速增长,并逐渐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改革之初,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很不完善的,不存在股票市场,国有银行只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乡镇的集体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几乎无法获得正规金融的支持。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困难的现象(林毅夫、李永军,2001;俞建国,2002;王霄、张捷,2003;林毅夫、孙希芳,2005)。但面临资本约束的中小企业却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军(Che & Qian,1998)。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并不必然阻碍发展。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究竟是如何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克服资本壁垒的?已有研究主要强调非正规金融所起的作用(如:Allen, Qian & Qian,2005;林毅夫、孙希芳,2005)。也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基于产业集群的农村工业化发展模式是这些地区快速工业化的主要形式(顾强、王缉慈,2003)。因而,可以推测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克服工业化资本壁垒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事实上,已有一些理论和案例的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的生产组织形式能够降低对初始资本的需求(Schmitz & Nadvi,1999;Sonobe & Otuska,2006)。但是,已有研究没有深入探讨这一观点,且没有建立在严格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与资本壁垒类似,技术与制度壁垒也是阻碍工业化萌芽的重要因素。已有的许多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案例研究描述了民营小企业突破制度和制度壁垒的过程,但是已有研究没有将这一突破过程放在产业集群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除了资本、技术与制度之外,企业家才能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因素(熊彼特,1997;张培刚,2002)。具体而言,企业家才能能够增

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创新,并且在一定的区域内能够产生积极的知识外溢效应(Van-Praag & Versloot,2007)。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早期阶段,企业家才能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而且企业家因为缺乏实践的机会而无法培育和增进其才能。因此,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因为无法有效地动员和培育企业家才能而陷入到经济停滞的困境中。然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农村工业化过程表明上述停滞的困境是可以避免的。Schmitz 和 Nadvi(1999)注意到产业集群通过分工能够充分动员人力资本,因而非常适合发展中国家。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深入探讨背后的机理,也没有提供实证的案例。

此外,对东亚产业集群发展历史的考察发现,许多产业集群实现了质量升级(Sonobe & Otsuka,2006),这一过程同样发生在中国制造业产业集群中。虽然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工业品的质量依然处在低级阶段,但是与自身的发展历史相比,在 30 来年时间里,中国工业品质量是在不断提升的。对质量升级的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组织领域,产业组织经济学家构建了许多理论模型解释产品质量升级的过程(如:Dasgupta & Stiglitz,1980;Reinganum,1985;Grossman & Helpman,1991)。这些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市场竞争是导致企业提升质量和实现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产业组织经济学家的研究框架中,质量升级是一个内生的自然而然的过程。Sonobe & Otsuka(2006)则进一步总结了东亚多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他们发现产业集群在发展初期主要采用数量扩张的竞争方式,到一定阶段后会过渡到质量竞争阶段。Sonobe 和 Otsuka 的工作为研究中国产业集群质量升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但是,Sonobe 和 Otsuka 未能回答的问题是,从数量扩张阶段发展到质量提升阶段的过程是否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是否有其他重要因素影响产业集群质量升级的成败?

本书首先对有关工业化与产业集群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指出本书在文献上可能的贡献;然后回顾和解释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企业演变历程,即从社队企业演变成乡镇企业,再从乡镇企业演变成基于产业集群的私营企业的过程;随后利用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计算中国产业集群的融资和绩效;进而,以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温州鞋业集群、织里童装产业集群为例,详细剖析了产业集群是如何克服工业化资本壁垒、技术壁垒、制度壁垒,以及如何动员企业家才能、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等问题;最后,本书以浙江省 100 多个产业集群为分析对象,研究危机与产业集群质量升级的内在关系。

2 有关工业化与产业集群的文献综述

本章梳理了有关工业化和产业集群的关键文献,从宏观上把握了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成果。文献综述以下面的逻辑展开,首先梳理了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工业化的经典理论,然后探寻了产业集群及其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综述了国内外最新的有关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最后指出本书对这一领域文献的可能贡献。需要说明的是,与每一章具体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综述将在后文相应章节的特定语境中展开。

2.1 工业化发展理论

2.1.1 古典经济学的工业化发展理论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斯密(Smith,1904)从分工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原因。在斯密的体系中,不断深化的劳动分工被认为是劳动生产率增进的根本原因。农业部门因为具有季节性、轮回性的特点,劳动分工程度要远低于工业部门,因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进速度要显著低于工业部门。斯密进一步指出,穷国与富国在财富上的差距主要由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差距所导致。斯密的理论指出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积累的重要性。

李嘉图(1976)进一步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李嘉图把有形资本积累看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他的观点与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工业化发展实际是相符的。李嘉图模型的前提假设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成本在长期来看是不上升的,因而投资的利润率不会下降。这种不下降的利润率能够为追加投资提供激励,从而企业利润被不断地用于再投资,工业部门的生产 and 就业就能够持续增长。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是固定的,那么人口的增长会导致食品价格的上升,工资成本随之上升,因而利润率

会下降,从而无法为追加投资提供有效的激励。这种制约工业化发展的固定土地资源禀赋机制被称为“李嘉图陷阱”。“李嘉图陷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不仅仅是工业部门本身的发展过程,它与农业部门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穆勒发表于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穆勒,1997)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穆勒将社会生产归结为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三要素。经济增长源于人口增长、资本增加和生产技术改良,其他种种导致社会产出变化的原因皆是这三种变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穆勒认为,从长期来看,利润率会趋于下降,经济增长最终会趋向一种静止状态。但是,穆勒所描述的静止状态并非一种经济停滞、生活贫困的社会状态,而是一个资本和人口不再增长,但人类的精神、道德及生产技术仍在发展的富裕而公正的理想社会。

总体而言,古典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源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相互作用。资本积累推动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反过来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增进又提高了资本积累。在方法论上,古典经济学家以社会关系为分析基础,强调竞争性市场的调节过程。但是,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边际革命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边际效用概念的引入使得经济学可以方便地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因而在技术上,经济学迅速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拥有自己的基本假设、分析工具和研究规则。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到资源最优配置上,尤其是在马歇尔(Marshall,1920)发表了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诞生的《经济学原理》之后,有关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理论成了一个不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主题。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2.1.2 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发展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促进新兴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发展成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也因此成为经济学中一个相对独立且重要的分支。20世纪50、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辉煌时期,当时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工业化发展理论。

Rosentein-Rodan(1943)最早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Balanced-growth)。Rosentein-Rodan 承袭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理论的核心是投资,发展中国家要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供给不足”的双重发展障碍,就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投资,给经济一次性的大推动,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到全面、均衡的状态,走出贫困恶性循环的

陷阱,因而这一理论也被称为大推进理论。但是,平衡增长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忽略了比较优势的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产业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更为符合发展规律(Lin, 2007);其次,在实践中,平衡增长理论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很难获得,发展中国家往往资本匮乏,且资本市场发展很不完善,要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的资本是非常困难的,除非采用政治手段通过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式,将农业部门的积累强行转移到工业部门,但这种发展方式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平衡增长理论在实践中没有成功的案例。

赫希曼(1991)认识到平衡增长理论的上述缺陷,对其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希曼认为一国工业化发展道路不必遵循全面发展的模式,不同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状态,有选择地对某些部门进行优先投资。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资源首先发展关联效应大的产业,以此为动力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地区间发展也应遵循同样的逻辑,具有优势的地区可以先形成发展极,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罗斯托(1960)持有与赫希曼类似的经济发展观点,并从动态角度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罗斯托认为社会的发展可以分成五个基本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农业经济、等级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过渡性社会、投资增长、社会行为方式转变),起飞阶段(投资率大于10%、生产进步),趋于成熟阶段(投资率大于20%、资源配置优化),大规模消费阶段(福利国家、大规模消费)。其中起飞阶段是经济增长的分水岭,跨越该阶段后,发展障碍得以克服,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路径。

赫希曼和罗斯托的理论描绘了一幅经济发展全景图。但是,他们的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对这一现象的漠视使上述发展理论脱离了社会现实,从而缺乏可操作性。Lewis(1954)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包含二元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发展模型。Lewis模型讲述这样的故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个是传统部门,另一个是现代部门。传统部门包含了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零星的商业和服务业,该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现代部门包含了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均较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的工资下限,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而其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现代部门的利润来自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的部分,并不断把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在Lewis模型中,传统部门被认为是次要的、从属的和被

动的。Fei 和 Ranis(1964)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他们据此发展了 Lewis 模型。此外,Chenery 和 Strout(1966)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他们因此提出了两缺口模型,阐明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国外资源来填补国内资源不足的发展模式。

中国发展经济学先驱张培刚(2002)也为工业化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培刚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工业化过程包括五项基本因素:人口、资源或动力、社会制度、生产技术以及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其中,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和生产技术属于发动因素,人口和资源属于限制因素,社会制度则既可能是发动因素,又可能是限制因素。

在上述发展经济学家构建宏大发展理论的同时,另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则通过建立增长模型研究增长原因。哈罗德—多马模型(Domar,1947;Harrod 1948)是这一领域的开创之作。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考察一个国家在长时期内国民收入和就业稳定均衡增长所需条件。哈罗德—多马模型反映了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加速数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产量比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要获得一定的增长率,就必须维持一定的能为投资所吸收的储蓄率;反之,若将一定的储蓄率形成的储蓄全部为投资所吸收,经济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哈罗德—多马模型采用了非常简单的固定系数生产函数,在这一模型中,经济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劳动必须充分就业,资本必须充分使用)才能达到均衡,而且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的可能性,这与现实世界的经济发展是不相符的。索洛(Solow,1957)认识到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他用新古典生产函数取代了固定系数生产函数,将哈罗德—多马模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索洛模型中,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来自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索洛假定生产函数符合规模报酬不变、边际产量递减,并且储蓄率一定、技术进步为外生。在这些假定下,索洛模型推出无论从任何一点出发,经济都会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通过调节储蓄率可以实现人均最优消费和最优资本存量的“黄金律”增长。但是索洛模型(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其他增长模型)的假定条件太苛刻,不能够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

上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理论主要形成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总的来说,这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可靠的市场体系,市场失效是这些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物质资本的积累是这些发展理论的核心。这些理论得出的一般政策建议是,国家应该推行强有力的干预性政策,通过协调和配置资

源,促进资本的积累,推进工业化发展。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其发展理论充满了自信,认为只要采取他们的政策建议就能够实现经济的结构转化、实现工业化、减少贫困。但是这些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过分强调资本的作用,给出的发展战略都把促进资本积累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因而,在实践中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然而,正如 Lin (2007)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因而过分追求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是不符合这些国家比较优势的。在实践上,这些发展理论也未能经受住检验,采用这些发展战略的国家并未能摆脱贫困的陷阱,因而这一时期的许多发展理论在后来均遭受了批评(Adelman, 2000)。上述这些缺陷导致了有关工业化的发展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转入低潮期,并且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2.1.3 内生增长理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经济学开始重新引起主流经济学的关注,这主要得益于 Romer (1986)和 Lucas (1988)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系统要想产生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克服回报递减的趋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寻找到一个持续的发动机,内生的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随后许多文献将更多的因素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对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给出了符合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解释。

内生增长理论为我们理解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视角。但是,Young (1992)、Krugman (1994),以及 Kim 和 Lau (1994)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内生增长理论无法充分解释东亚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他们指出,东亚快速工业化过程主要得益于投资的增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并不明显。实际上,东亚快速工业化过程是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密切相关的(Sonobe & Otsuka, 2006)。但是,无论是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没有将产业集群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因而上述理论在解释早期东亚的发展以及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农村工业化过程上是缺乏力度的,利用上述理论从宏观角度展开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模式化和表面化的。